

中国 农村 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期刊网(CNKI)入选集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2011年卷·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研究·2011年·上/徐勇等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61-0311-1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农村经济—研究报告—中国—2011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527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等

责任校对 宗 和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1(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农村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陆学艺 张厚安

主编：徐 勇

副主编：项继权

执行主编：唐 鸣

执行编辑：刘义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邓大才	王敬尧	王金红
-----	-----	-----	-----

石 挺	刘义强	何包钢	宋亚平
-----	-----	-----	-----

吴理财	李德芳	陆学艺	杨海蛟
-----	-----	-----	-----

项继权	贺东航	党国英	徐 勇
-----	-----	-----	-----

唐 鸣	高秉雄	曹 阳	谢庆奎
-----	-----	-----	-----

景跃进	董江爱	詹成付	Jean Oi
-----	-----	-----	---------

Stig thøgersen

目 录

农村民主与治理专题

三次“村治实验”历程与经验

- 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村庄实验为基础的分析 马 华 (5)
中国的“难点村”:“脆”国家与“碎”社会失衡互动视角的考察 刘义强 (70)

丛林般的“瞭望塔”

- 广西合寨村民自治生发机制的一个政治地理学解释 王 勇 (90)

圈层社会:农村选举背后的运行逻辑

- 基于“海选”第一村北老壕村第八届换届选举的观察 陈 明 (106)

民主不合作:村民自治的困境分析

- 以全国“海选第一村”北老壕村的治理为例 夏 添 (175)

国家转型与农村改革

走出农村教育“增量改革”的困局

李芝兰 袁方成 (189)

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农村改革三十年历程反思

- 从洪林村说起 罗 峰 (201)

基层治理实务

乡镇治理中的政治关系

- 以海南省为例的研究 李德芳 李宜钊 (217)

- 村民代表会议的源起、运行和改革发展 熊 娜 (250)
超市场契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
——以“股田制”和“承租返包”为例 徐忠爱 (268)
台湾村里行政组织治理实务
——以花莲县为例 廖南贵 (293)

田野拾慧

- 描述性文字是否能与问卷调研互动?
——调查员田野观察日记关键词统计的发现 杨兴洪 (311)

农村民主与治理专题

◆三次“村治实验”历程与经验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农民的特征已经逐渐隐退，以政权、政党为依托的纵向治理体制已经建立，来自乡村内生型治理机制即村民自治也在农村扎根成长，这期间必然要有一个制度磨合的过程，如何建设一个与现代化国家要求相匹配的现代型农村，这成为理论界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以实证研究见长的学术型机构，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始终是中心高举的一面旗帜，为此，农村研究中心一方面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深入农村进行村治实验，以便及时检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中心”的三次村治实验可以分类为：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的黄梅实验、以组织建设为内容的岳村实验、以能力建设为内容的南农实验。整个实验始终坚持赋权、参与、自治、自为的实验理念，以自主性、多样化为原则，始终把农民当作建设的主体。本文就是对上述理念、原则指导下的三次村治实验的一个整体回顾与经验反思。

◆中国的“难点村”：

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这种适应农业社会形态的城乡分治格局，尤其是国家政权难以有效动员整个社会参与现代经济建设和国际竞争的形势，使得在西方武力逼迫中被迫现代化的农业帝国顿时危机重重。现代化过程，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一个工商业社会逐步替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在相当多的现代化论者和政策实践者看来，农民及其所生活的整个体系往往与一个正日渐成为过去时的旧世界紧密联系，而与正在现代化中的现代世界则难以相容。经典研究也认为，农民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不是现代化的敌人，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无可奈何的牺牲品。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早发国家，其进程中也不乏农民和农村阶级在面对经济和社会巨变中发出的声声哀鸣。而对于以传统政治和社会全面崩溃为基本状况进入现代世界的中国来说，农村社会的困苦和衰败则更是与现代化进程形影

相随。

◆丛林般的“瞭望塔”

正值“村民自治暨合寨村村民委员会成立30周年”在广西宜州召开之际（2010年11月28日至30日），笔者有幸参观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广西合寨村。在环视村落周边的这种钟形曲线般的山峰时有了另外一个发现——这些山峰更像是一个一个的“瞭望塔”。笔者觉得，这个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村民自治率先发端于广西合寨村（包括宜州市的其他一些村落）而不是其他地方？在开阔而相对平坦的田野上，间或矗立着一个一个的钟形曲线般的山峰，这就是笔者对广西地形地貌的一个初步而直观的意象。在合寨村中行走并环顾四周时，同样印证了我的这一视觉意象。这些山峰在人民公社时期，必定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这就是“瞭望塔”的功能。

◆圈层社会：农村选举背后的运行逻辑

每个圈层内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进而构成了农村社会内部微观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村庄内部的利益交换网络和权力生成机制。村庄圈层社会的互动结构，展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固有的微观运行机制。从民主发育的角度看，农村基层选举运行于农村社会生活内部，在运行过程中，被农村社会中的圈层特性所覆盖，并呈现出不同于制度理性和民主预设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最直接的显现就是各个圈层之间的互动，进而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整体再造与重塑，打破原有的社会资源网络，从社会发展和民主制度发育的角度上，促进了基层民主在农村社会的成长与深化。

◆民主不合作：村民自治的困境分析

总的来说，制度设计的偏向、市场经济的自利机制、惠农政策的个体导向和货币压力效应使得农村社会内部农民个体自立性倾向明显，合作意向和合作能力匮乏。在村民自治的实践和运行中，这种不合作就直接表现为民主不合作。在村民自治的民主动员中可以实现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培育，却无法培育村庄治理结构中需要的农民合作能力。民主不合作是我国村民自治困境的内在机制与逻辑。这种机制在早期通过隐藏在一

定的自治制度和自治事件中，表现出异化、内卷化、失衡和空壳化的征候。随着村民自治的民主动员的深入，民主不合作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进而成为村民自治深化和功能实现的屏障。

三次“村治实验”历程与经验

——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村庄实验为基础的分析^{*}

马 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武汉 430079)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许昌 461000)

内容提要：村治实验的概念可以解释为，在相对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汇集多方资源，共同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综合建设与发展尝试。与旧时期的乡村建设相比，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三次村治实验可以称作是“新”乡村建设实验，这里所指的“新”主要是当前的村治实验已经与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其特征是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尊重多样化、自主化；其目标是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型的新型农村社区。本文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的角度回顾了历时达13年之久的“中心”三次村治实验，其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和学习。

关键词：制度 组织 合作 表达 参与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大地上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当时社会的背景看其处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层次，从内容上看涉及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农民素质，这其中已经孕育了农村政治自治化、民主化以及乡村建设现代化的思想。如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农民的特征已经逐渐隐退，以政权、政党为依托的纵向治理体制已经建立，来自乡村内生型治理机制即村民自治也在农村扎根成长，这期间必然要有一个制度磨合的过程，如何建设一个与现代化国家要求相匹配的

* 此文是《农民合作能力与表达能力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现代型农村，这成为理论界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以实证研究见长的学术型机构，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始终是“中心”高举的一面旗帜，为此，我们中心一方面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深入农村进行村治实验，以便及时检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中心”的三次村治实验可以分类为：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的黄梅实验。以组织建设为内容的岳村实验、以能力建设为内容的南农实验。整个实验始终坚持赋权、参与、自治、自为的实验理念，以自主性、多样化为原则，始终把农民当作建设的主体。本文就是对上述理念、原则指导下的三次村治实验的一个整体回顾与经验反思。

一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乡土 建设之路由何而起？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把理论置于实践之中才能判断其正确与否，同时，它也是深化和丰富理论的重要方式。“中心”是以实证研究见长的学术研究机构，“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可以说是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旗帜。其中“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2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作为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的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村内部的利益调整迫使学术界做出相应的理论回应，为了能迅速捕捉到当前农村内部发生的变化，及时检验中心多年来的理论探索，“中心”从1996年至2009年历时13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村治实验。分别为：1996—1998年的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以下简称月村）“民主管理”实验；2004—2006年安徽蒙城岳东村“农村社区综合发展”实验；2006—2009年广东省分别选取欧村、广育村、铁场村、上能村开展“南农实验”。从实验时间看“中心”的村治实验具有延续性；从实验类别看“中心”的历次实验分别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这些不同种类的村治实验也可以称作政治实验，不仅仅积累了大量的基层治理经验，从研究方法上看，用政治实验验证政治理论也丰富了社会科学中实践导向型研究，这种实验

型研究的好处是可以弥补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现场感不足，可以检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

上述论证是从发展理论的角度阐释进行村治实验的意义，之所以重走乡村建设之路进行村治实验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曾先后展开了各种类型的乡村建设实验，当时实验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经济社会矛盾尤为突出，体制混乱、农业衰败，农民生活处于挣扎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一批试图“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有识之士，他们怀着“民族再造”的梦想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据当时统计的数字，各种类型的乡村建设团体达600个之多。较为著名的有：南宁国民政府主持的“江宁实验”；地方政府阎锡山倡导的“山西村政建设”；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高阳主持的“无锡实验”；黄炎培主持的“徐公桥实验”以及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践”。从这些机构的性质看，有官方的，有半官方的，有纯粹学术性机构，教育单位，地方势力派等。尽管各种团体从事的都是乡村建设，具体的建设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当时曾参与乡村建设的孙月平把它归纳为：从动机上分析，有的地方政府鉴于当地农村形势不好，由此授权教育机构或学术团体进行实验，如邹平实验、定县实验等；有的是教育机构本身的自觉，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的实验；有的是政府推行政策，改革政治，如江宁实验、兰溪实验等。从运用力量上看，有的是政府力量强力推动，如山西省村制改革；有的是运动教育力量，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从采取的方式看，有的是法令或行政命令的形式，一切以政府的意愿为主导，民众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有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凡是实验区所有经济社会事业均有学校负责指导，如陶行知的晓庄学校；有的是以学术团队为指导，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① 上述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实验由于历史客观原因大都以失败告终，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失败的只是实验，很多好的经验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如发展生产方面，他们主张办企业、发展副业、推广优良

^① 孙月平：《从乡建的现况研究推进乡建的动力》，载《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7卷第1期。

品种、引进先进农具等；文化卫生建设方面，他们除旧布新，禁烟、禁赌、放足、剪辫、修桥补路、建公共厕所等；民主建设方面，建立民主式的机构，如村民会议、村学乡学、公民服务团等。有位历史工作者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曾给予这样的评价“如果说韩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农村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那么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建设实验，则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教训和经验都是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①

正是有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张厚安为代表的“中心”老一辈学者开始将村治的研究路径转向田野，开始关注尚不为人所注意的基层草根性民主的村民自治研究；徐勇、项继权等又承接张厚安先生的研究，将村民自治研究扩展为村级治理研究。研究视角的拓展最先诞生了“黄梅实验”，该实验是“中心”在湖北省政府支持下，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进行的一场村治改革的社会实验，其目的是力图将当时我们关于村民自治的知识和理论运用于实际，以实践由张厚安所倡导的“理论务农”和“理论支农”的主张。与以往乡村建设运动相比，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实验大都以“救活农村”，实现民族再造为导向的拯救农村运动，“中心”提倡的村治实验是以建设新农村，深化村民自治、构建和谐社会为导向的现代型、民主型村庄治理。从运用力量上看，以往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部分依靠行政命令或单一的学校社团等，农民往往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中心的村治实验提倡的是以外部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农民自主、自为共同参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各类实验，如南农实验就是通过媒体征求，由 60 多个村庄中选取四个村作为实验村，这充分体现了农民参与的主体性。这种学术机构 + 地方政府 + 实验村的实验模式极大调动了各方资源，确保了各项实验能够顺利进行。从现代国家成长的过程来看，民国末年的乡村建设运动还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层次，“中心”的村治实验已经发展为现代民主国家构建的层次。因此，可以把“中心”十几年来的乡村建设实验的目的归纳为，发展检验村民自治理论的实验场。通过制度下乡、组织构造、能力提升等来锻造、检验村民自治在基层的生命力，从而为丰富、活跃村民自治这个“有机体”积累宝贵的经验。

^① 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二 “制度”进村：湖北黄梅实验

（一）黄梅实验缘起与村情简介

1. 实验缘起

1996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选取湖北省黄梅县月村展开“民主管理”实验，该实验共进行两年于1998年结束。黄梅实验的诞生标志着“中心”此等一系列村治实验由此拉开序幕。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还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之所以选择此时进行村治实验，笔者认为，这与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密不可分，村民自治一出现就被人视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与此同时，它也因为其“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而招致理论界的质疑。不进一步解决理论问题，会影响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以研究村民自治而见长的学术型机构，直接感受和体会到村民自治在争论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刚起步，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89年，许多人对是否在农村继续推行以基层民主为导向的村民自治持怀疑态度，担心实行村民自治会把农村社会也搞乱了。正是在这一紧要关头，中央领导同志认为现在不是争论村民自治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得更好。1990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村级组织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明确指出：“每个县都要选择几个或十几个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摸索经验，树立典型”。村民自治因此由点到面，由示范到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后来写入党代会报告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四个民主”的提法就来自于村民自治实践。正是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们开始走向实践，以发现和总结村民自治的实践经验为自己的使命，并将实证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①由此背景下，“中心”老一辈学者张厚安等人于1996年根据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向中共湖北省委提交了在湖北省选择一个村进行“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实验的报告。该报告得到省委书记贾志杰的直接支持。在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荐下，我们选择鄂东地区黄梅县月村进行村治实验。该实验强调的是

^① 徐勇：《村民自治：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载《人民论坛》2008年第17期。

制度建设，其目的是通过制度下乡直接在乡土平台检验村庄治理过程中哪些制度是有效的，哪些制度需要加强和丰富，由此来为成长中的村民自治制度添砖加瓦。

2. 村情简介

月村隶属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该镇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位于九江长江大桥北岸桥头，沪蓉高速、105国道穿境而过，京九、合九两条铁路在此接轨设站，长江黄金水道穿境 18 华里，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江西省九江市一桥之隔。素有“鄂东门户”和商贸旅游“金三角”之称，先后被列为省级开发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省重点口子镇。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月村就成为地、县两级重点扶持的先进典型，1990 年代以后，该村经济发展迅速，被称为“黄冈市十强”和“黄梅县第一村”。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当地领导人主动介绍中心到该村进行村治实验。该村的基本村情是：该村有 10 个村民小组，550 户，2400 多人。劳动力 1010 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有 705 人，从事工业的 200 人（其中建筑业 110 人），交通运输业 20 人，批零贸易 30 人，其他非农业劳动力 55 人。该村地域面积有 3.34 平方公里，田地 1749 亩（水田 1080 亩，旱地 669 亩），藕田 800 亩，大棚蔬菜 500 亩，鱼池 600 亩。村民大多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开放意识和商品意识较强。村民生产的蔬菜多运到长江对岸的九江变卖。群众生活也较富裕。

（二）从制度求民主：依法建制，以制治村

1. 制度进村第一步：发现问题

“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可谓是我们进行黄梅实验的实验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张厚安等老一辈学者带领中心科研人员进驻月村，入村后经过认真的调查评估。我们发现实验开始之时也正是该村陷入困境之时。当时中共中央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要求是“三有”（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该村的现实却基本上是“三无”。自 1996年下半年，村干部“人心思走”。村委会主任多次提出辞职，后自动离职。副书记和会计先后被解职和离职。村出纳一年多未管事。村干部中仅有支部书记一人维持工作。该村 1996 年上报收入虽达 1 亿多元，但村集体却无可支配的资金。财力缺乏的原因源于工业兴村的失败导致村级负债。在这种局面下，“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三个方面，当务之急是“有人管事”。1997 年初我们实验组进村时，正值湖北省统一进行村民

委员会换届选举。水月庵村所在的镇党委希望通过村两委（村支委和村委会）的换届选举解决“有人管事”问题。既然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理所当然要按照《村组法》进行。但当时实验人员了解的情况是，该村过去并没有严格按照《村组法》规定，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干部。为了验证该村村民是否有进行民主选举的需求，我们实验人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调查人数占该村合法选民的8%，共计有100人左右都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直接选举。部分人因为第一次了解到有一部法律允许村民直接选干部而惊讶。此外该村村民居住较为集中，交通文化设施便利，村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符合直选的具体条件。通过实际的需求评估，我们总结出该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问题之一是管理不够民主，村委班子处于瘫痪状态；问题之二是群众丧失了发展信心，村办企业全部倒闭；问题之三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治理体制导致村庄内生力量不足；问题之四是民主监督机制不能有效运转，权力缺乏制衡和有效监督。

2. 制度进村第二步：解决问题

（1）民主选举

通过深入水月庵村进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村组法》虽然已经实行多年，但由于政策下乡过程毕竟要经历一个本土发育的缓慢过程，因此水月庵村各项村治制度的实践还不够完善，这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否足够科学，为了检验我们的村级民主的第一步“民主选举”是否有足够的生命力，我们在水月庵村展开了该村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心”的实验工作也由此切入，当时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以宣传贯彻《村组法》的形式参与选举过程，在程序、规范、技术等方面给予咨询和指导，但不直接干预选举过程。由于月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在村领导基本瘫痪的背景下进行的，且是第一次真正由村民直接选举，因此引起各方面关注和重视。

以往的惯例，在村委会选举前进行村支委换届选举。换届后的村支部副书记便是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本次选举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地镇党委决定村支部和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不设框框。候选人和当选人完全由事先确定的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来决定。依据当时实验参与人员的记载，我们一起重温那次选举过程，1997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进行村支部换届选举。首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预选，由党员群众直接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出6名正式候选人。随后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正

式选举产生 5 位支部委员，组成新一届村支部。在村支部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村民李不仅进入 6 名候选人之列，而且以仅次于支部书记的高票当选为村支部副书记。这是镇领导和村书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在村支部预选后，主持选举的镇领导对要不要当场公布预选结果一直拿不定主意。只是在党员的强烈要求下，镇领导才决定当场宣布预选结果。村民李也才有可能在正式选举中当选为副书记。所以，村民李可以说是从票箱里“跳”出的一匹“黑马”。选举结果当场公布后，在场党员热烈鼓掌，群情激动。一些党员甚至将选举会议视为月村的“遵义会议”，是该村历史上的转折点。镇领导也认可了这一结果。村民李为何能从票箱“跳”出，一般党员为何中意这匹“黑马”？主要原因在于村民李的独特经历和素质。村民李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曾担任过大队干部。当时的干部信奉的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他在带头劳动中累坏了腰，至今还常闹腰痛。同时，他为人耿直，作风踏实，清正廉洁，被人称为“毛式干部”（意为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在勤劳的村民中有很高声誉。党员们希望他重新出山，改变村集体经济管理混乱的局面。5 月 20 日，召开全村选民大会进行正式选举。选民以无记名、秘密写票方式差额选举出新一届村委会。由于是差额选举，村委会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好几位候选人都以稍领先于他人的票数而当选的。但唯独村民李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总有效票为 1251 票，他得 1083 票。对此次选举各方都比较满意。主持选举大会的镇委书记表示：“这次选举出乎意料地令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都很满意，从组织工作到具体操作都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将在 24 个村推广这个成功的经验。”村民们认为这是月村“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据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实地调查和对一些村民自治模范村的选举观摩，月村的村委会选举在民主程序上可以说是领先的。

出人预料的是，村委会换届选举才 200 天，高票当选且踌躇满志的村民李竟自动辞职。镇、村干部和村民再三挽留，无奈村民李去意坚决，不再管事，令选民们大失所望。为使村里“有人管事”，月村不得不于村委会换届选举一年后再次启动民主选举程序——改选村主任。与前次选举相比，村主任改选的民主程度更高，程序更严格，竞争更激烈。经过一番激烈角逐，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是村民钟和村民余位居前两名，成为村主任正式候选人。这一结果与预选会议关于选一个能干又愿干的人的共识是一致的。正式候选人产生后便是正式选举，由于工作细致，投票率在